

黑死病前后的欧洲

薛 国 中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薛国中(1929-),男,湖北巴东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从事15-16世纪世界史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黑死病前,欧洲农业长期滞后,生产力的进步不适应人口的增长。在生产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人们只知无限度地开荒,向山林川泽争夺耕地,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黑死病的发生与广泛流行。瘟疫使西欧人口锐减,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农民乘机加强开展自身解放的斗争,从而加速农奴制的瓦解,也使欧洲的封建领主逐渐放弃农业,改营商业性畜牧业,从而使欧洲逐渐迈入商品经济时代。

关键词 黑死病 人口过剩 承佃金 继佃金 分益佃耕制

中图分类号 K 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4-0098-07

14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即黑死病广泛流行,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西方学者们对这场瘟疫十分重视,认为它“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①;“是一条鸿沟,把欧洲经济分为两个长的时期”^②。自然灾害本是常见的事,不足为怪,更不应该定为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但就14世纪欧洲出现的这场瘟疫来说,无论其发生、蔓延和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确不可等闲视之。为此,本文拟对这次瘟疫的发生及其前后欧洲的社会经济的变化作一些考察。此考察只能是粗略的,而且限于农业方面。

时至当今,农业仍是全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是这样,近代以前更勿须说了。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无疑是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谷物生产又是重中之重。至10世纪,欧洲各处的耕地仍以生产谷物为主,就是在气候不适宜于农业的地区,如大西洋沿岸过分潮湿的地区,亦坚持种植谷物,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谷物生产在农业中的比重大幅

度上升。德国西北部在12-13世纪期间,谷物种植渐渐取代了原始农业中养猪与森林开发。谷物经济占主要地位是12至15世纪法国农业的特点^③。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和波罗的海南岸的广大地带,到中世纪晚期一直是西欧粮食供应基地。英国是盛产羊毛的大国,为发展养羊业,在15-16世纪进行了改农田为牧场的“圈地运动”,然而被圈围的土地不到全国土地面积的3%,大部分可耕地主要种植谷物,其余栽培经济作物。西班牙的羊毛在中世纪颇负盛名,然其养羊业也只限于北部山区和中部梅塞塔(Meseta)高原,这些地方本不宜于农业的发展。平原地区还是以种植谷物为主的农业。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经济作物也有所发展,如亚麻、大麻、葡萄,但仍占次要地位,仅供自给。总之,对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来说,其发展之速缓取决于农业的景况;农业的景况如何取决于谷物生产的丰歉。谷物生产的丰歉乃人们生计和命运之所系。其他农业作物虽也是生活所需,但毕竟没有决定意义。

总的来看,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不论农业、工业、商业和城市,都在逐渐发展,但发展非常迟缓。作

为全社会主要产业和基础的农业,迄14世纪初,仍处于初期阶段。耕畜不足是农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整个中世纪,即使最富有的农户也缺乏足够的耕牛以应耕地的需要。很多农户根本没有牛马,有的只能以高昂的代价向富户租用耕畜。13世纪,英国温切斯特(Winchester)教区的庄园内,多达40%的佃户没有拉犁的牲口^①,完全靠人力耕种。

中世纪欧洲农业落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耕作粗放,生产工具无大改进,尤其是肥料不足。有关资料指出,大多数庄园饲养几头牲畜,只能提供很少的厩肥。他们未能很好地认识到畜牧业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关系^②,对牲畜粪便未能充分合理应用以增强土地肥力。“中古欧洲农业耕作制的一个内在特点,似乎是持续(土地)疲惫、肥料不足、过度耕作与不够休耕的田地”^③。他们主要靠两圃制或三圃制休耕,让土地自己蓄积肥力。一块耕地肥力消耗殆尽,农民不是增施肥料,而是去开垦新的土地。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排灌事业,只限于意大利北部平原,虽始于13世纪,而15世纪后才有大的发展。低地国家的水利建设,主要是防御海浪的袭击,因为这个地区有40%位于海平线之下。

由于缺乏畜力和耕作方式落后,欧洲中世纪谷物产量非常低下。英国谷物产量增长缓慢,几乎察觉不到。1200—1450年,每英亩小麦产量从8蒲式耳提高到8.5蒲式耳,历时250年只增加了0.5蒲式耳。生产率按种子与产量比例计,以格罗兰(Crowland)大修道院的农庄为例,1271—1291年为1:6.07,1291—1308年为1:6.9,1361—1381年为1:7.6,1381—1401年为1:9.93^④。12世纪中叶的一本农产目录记载的英国克吕尼(Cluniac)修道院的两个相近庄园的种子与产量比例,分别为1:6与1:2。欧洲大陆各地土壤、气候不同,产量各异,且很不稳定。法国南部勃艮第地区一个村庄的谷物生产率头年为1:10,而第二年竟降为1:3。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小庄园,平时生产率为1:4或1:5,1348年降到1:1.6。只有极个别地方生产率较高,如巴黎近郊圣德尼(St. Denis)修道院的庄园,在13—14世纪,小麦生产率为1:8;法国北部的亚多亚(Artois)的一个庄园,1335年为1:15,这是欧洲最高的记录。“对大部分欧洲农民来说,如果收获是播种的三四倍,他们已经很满意了”^⑤。同时期中国的谷物生产率,北方为1:12.5,南方为1:18.7。在靠天吃饭的时代,中世纪欧洲如此低下的生产率,绝对不能持久地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

欧洲中世纪后期,人口大为膨胀。西方学者根据中世纪残留下来的零星资料,如人头税册、炉灶税清单、地租帐目和佃户名册等,推测某地区以及全欧洲的人口数量。由于所据资料不同,推算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意见,即认为欧洲人口在11至14世纪中叶期间,总人口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左右。拉塞尔(Russell)的推算似乎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将全欧从500年至1450年期间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分别作了估计,其中1000年与1340年各地区人口是:南欧分别为1700万与2500万;西欧、中欧与北欧分别为1200万与3500万,这是欧洲人口发展最快的地区,增加了几乎3倍;东欧分别为950万与1300万。由于地理和社会条件的差异,不仅大区人口发展不平衡,各小区也差别很大,如南欧内,意大利从1000年的500万,到1340年增为1000万,翻了一番;希腊与巴尔干半岛从500万增为600万;西班牙半岛从700万增为900万。按照拉塞尔的估计,全欧人口从1000年的3850万到1340年增为7350万,在340年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⑥。

增加了一倍人口,就需要增加一倍的食粮,也就需有增大一倍的耕地。农户普遍感到土地不足,西欧尤为严重。低地国地区的那慕尔(Namur)有3个村庄,占有耕地不足4公顷的农户,分别为38%、54%、73%^⑦。据庞兹说,“一家农户若靠耕种远不足10公顷土地是不能生活的。”^⑧。佛兰德地区有一个村庄,2/3的农户田地不超过1阿邦(arpent约1英亩),1/6的农户只2阿邦^⑨。

因耕地不足而引发的地价、地租和谷价上涨问题日趋严重。由于没有全欧的资料,只能引用个别地方的统计数字,或可窥斑见豹。关于地价,法国1201—1250年,每公顷价806克银,1251—1300年增为1050克银,一百年内上扬了30.4%;摩泽尔(Moselle)地区,1100—1200年每公顷为520克银,1301—1350年为928克银,一个半世纪内增长了78.5%。德国西南部土地每摩肯(Morgen,相当2英亩)从1200年到1300年上升了100%;下萨克森(Sachsen)土地平均价格,1150—1200年为9.4科隆马克,1200—1250年为15科隆马克,1251—1290年为28.3科隆马克^⑩,不到一个半世纪提高了3倍。关于地租,意大利中部皮斯托亚(Pistoia)的变动情况:以1201—1225年为100,1226—1250年为153,1251—1275年为178^⑪。关于谷价,法默尔(Farmer)

和罗格斯(Rogers)均以1201-1225年为100,将1201-1325年按25年划分若干阶段进行推算,法默尔推算出的增长指数为110 136 147及181,罗格斯推算出的指数为111 140 149及188^①。二人结论大体相同,表明他们的推算基本符合事实。在这期间也有个别地方和个别时候有谷价下跌的现象,那是由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的,诸如十字军从东方带回了大量贵金属,增加了欧洲社会中的货币流通量;交通方便的地方,从外地输入谷物;贫困农户为偿还债务或赎回奴役性义务劳役,在庄稼未成熟时被迫低价预售自己的粮食(商人收购后则以高价售出)。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地方人口稀少而又谷物丰收的事,如英国在1236-1253年,德国在1260-1262-1288年农业丰收,本地谷价低落。这些毕竟是短期和个别的现象。

原耕地不足则大力开垦新的耕地。垦荒有两个方向,一是大区向外扩展,北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北部,东向易北河以东广大地区,这些地方人烟稀疏,确有大量空间土地可开垦为农田,尤其是斯拉夫地区,后来几乎成为欧洲的粮仓。二是大区内已耕农田向边缘扩展。这些区域内可供耕种的土地已所剩无几,垦荒的犁头主要指向山林川泽,或毁林开荒,或填湖造田。11-13世纪,垦荒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西方经济史著作对此大书特书,称之为“伟大的垦荒时代”,“经济大发展时期”,“中世纪鼎盛阶段”,等等。确实,这个时期内欧洲的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了,谷物及其他农作物较前丰富了,但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更严重的危机。

垦荒完全是无计划、盲目地进行。西方经济史著作中不乏关于垦荒的记述:“欧洲内地拓荒地区的扩大,是以砍伐森林,开发沼泽与开垦荒原来完成的。”^②“在欧洲很多地方,清除森林不再只为了补充耕地,而成为一种不断侵占牧地、沼泽与森林的占夺运动。”^③德国从西部、南部到东部,“到处都有新的可耕地,砍伐的灌木丛与森林,比以往要大若干倍”。“在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区的法国区域,把土地开垦为农田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非常陡险的斜坡也不断开垦,瘦瘠和易于受侵蚀的土壤被翻耕,以致永远破坏了土壤和植被”^④。“巴黎盆地东部的湿地香槟(即香槟,Champagne)的森林和沼泽是大大减少了。”^⑤诺曼底地区的森林因开垦而受到严重砍伐。意大利“像北欧一样,在10-14世纪初期,把广袤的草场、森林和沼泽开垦出来耕种”。地中海地区到15世纪,原来的植被大部分不见了,“砍伐树木的一个

结果是加速了土壤冲蚀”,“因此,在许多高地区域,大部分是光秃秃的岩石”^⑥。“在低地国,耕地的扩大是与排除沼泽积水和开垦荒地紧密相连的”,从11世纪开始,持续到13世纪^⑦。“在斯堪的那维亚,伟大的土地扩张进入到森林”^⑧。“英国的森林亦被大量砍掉”^⑨。“过渡地消耗林木,草地面积的缩小,亦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与肥料的供应。”^⑩“12世纪后半叶及整个13-14世纪,在(英国)东北部,过去一直是草地、丛林和牧场的地方,建立起许多村落。”林肯郡在14世纪中期,以毁掉森林、丛林和荆棘而开垦的耕地面积,达到700英亩以上^⑪。毁林填湖,破坏植被,打乱了自然界生态平衡,上帝是不会饶恕的,必将予以严厉的惩罚。

三

惩罚果然降临了。14世纪开始不久,欧洲气候就发生非常恶劣的变化:春寒袭人,洪水泛滥;夏季淫雨,间有冰雹,寒冷潮湿,庄稼不能很好成长;秋天仍旧潮湿,庄稼不能黄熟;冬季严寒而漫长,庄稼冻死在地里。这样的气候持续了好几年^⑫。农业丰产的中欧河谷地区,土壤的湿度提高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冰河延伸了,北大西洋风暴的袭击愈加频繁。恶劣气候造成连年农业严重歉收。仅以英格兰南部的温切斯特主教区为例,该区1310年的收成明显低于1307-1308年的平均产量,而1315年低36%,1316年低45%,1317年仍低13%^⑬。产量低下,谷物价格自然上涨。该教区小麦,1317年的最高价是1313年最低价的5倍^⑭。法国东部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地区,1313-1317年间,黑麦价格提高了3倍。据达文德(D'Avend)估计,这个时期法国小麦价格平均增涨了9倍^⑮。英国、法国和佛兰德的谷价,涨到超过许多人的购买能力。整个欧洲,除东欧外,均长期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饿殍载道,哀鸿遍野。1302-1305年,法国南部发生饥荒^⑯。1309-1311年,德国南部、中部和西部发生饥荒,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及英国^⑰。1315-1317年受饥寒威胁的地区包括英、法、斯堪的那维亚、德国、低地国地区。广大贫苦人民无力购买昂贵的粮食,只有以树皮、草根甚至已死动物的腐肉充饥^⑱。食粮缺乏,营养不良,必然导致疾病流行,大批人民和牲畜死于饥寒和疾病。英国温切斯特地区,1317年的死亡率比1310年高一倍。1316年5月1日至11月1日半年之内,尼德兰地区之布鲁日损失人口5%^⑲。14世纪头20年的饥寒、疾病与死亡,只不过是随后而来的更大灾难的前

奏。

1347—1351年,欧洲发生了空前恐怖的瘟疫,即黑死病,是一种流行迅猛、破坏性极大的传染病。据说是1347年从亚洲随热那亚的商船带入地中海,迅速蔓延于整个意大利半岛和马赛。1348年由马赛侵入法国内地,传入西班牙,再由意大利或法国传入奥地利、德国、瑞士及匈牙利。1349年由法国诺曼底渡海峡传入大不列颠。1350年侵入斯堪的那维亚。1351年末在欧洲北部边缘消失。几乎整个欧洲受到这个病魔的袭击,只有低地国地区、比利牛斯山脉西部及波兰中部等地幸免于难。

在这次大瘟疫中,欧洲人口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一般是人口愈密集的地方死亡率愈高,城市比农村高,老年儿童比成年人高,最严重地区几乎全部死亡。法国南部阿维尼翁(Avignon),据说每天死亡400人,有700家闭门绝户。编年史家估计,该城市死亡总数达6.2万人。全欧死亡人数估计达2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3,严重地区达2/3^①。

有些西方学者断定黑死病是由中国传去的。此说毫无根据。14世纪中国并未发生大的流行性疾病,巴巴拉·W.塔奇曼指出,“说起源于中国,是14世纪的一种错误观念”^②。欧洲在10—13世纪对土地过度的开垦,破坏生态平衡,造成天灾、饥馑和疾病,才是14世纪中叶瘟疫大流行的根本原因。“人口过剩和在边疆土地的过分扩张,为后来14世纪蹂躏性的饥馑和疾病的流行,开辟了道路。”^③

四

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给欧洲带来极大的灾难,大量人口死亡,大片耕地荒废,不仅在10—13世纪新垦殖的土地,除东欧外,均被弃而不耕,就是旧日的熟田也不少无人耕种。这样的景况持续到15世纪中叶以后才渐渐缓和过来。西方学者称这个时期为“欧洲农业萧条时期”,“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但在这萧条、黑暗中,却蕴藏着新的机运。饥馑、瘟疫、死亡固然对社会和人类造成巨大的创伤,同时也打乱了似乎平静的社会旧秩序,加速了12世纪已经开始的农奴制的瓦解,重新调整了农业与畜牧业的经济布局。这些都为近代社会的登场鸣锣开道。

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庄园农奴制,从11世纪后期或12世纪初期就显出了裂痕。由于商业的发展,货币像一个坚实不拔的楔子插入人们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而改变各阶级的价值取向。领主不愿继续过那种低水平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而面向市场,需求更

多的现金或实物来换取种种奢华的生活物品。但用加强对庄园农奴义务劳役的旧办法,除了遭到各种形式的强烈反抗外,不能得到别的东西。不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只有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才能较多地获取。祖祖辈辈受奴役的广大农奴,希望能用实物或现金来代替他们对领主的沉重劳役,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随心所欲地去从事有利于自己的工作,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领主与农奴的目的各自不同,但改变庄园旧的经营模式则是共同的意向;正是这种趋同的意向,不可阻挡地把农奴制打开了一个永远无法修复的裂口。

改变以义务劳动为基本特征的农奴制,在14世纪以前,其主要形式是租赁制,即领主作为土地所有者,将原分给农民的份地以出租的形式给农民耕种。农民在租赁时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承担佃金(entry fine),收获后必须向领主交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租期长短各地不同,法国有的地方分3年、6年和9年,德国西部科隆地区分为5年、9年、12年或15年^④,这是领主便于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地租定额作有利于他们的调整。承租的农民不再向领主服各种义务劳役,摆脱对领主的封建依附,成为自由农民,劳动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收获除交纳地租外,其余归己,多劳多得,剩余物品可在市场上出售,换取现金或其他生活用品。14世纪以前,人多地少,土地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争着向领主承租,子孙继佃还须交纳继佃金(heriot),领主则乘机提高承佃金、地租和继佃金,如英格兰东部郡的拉姆塞(Ramsey)大寺院的各庄园继佃金在1250年为1英镑,1300年后增为3英镑。有人称此时的地租为“竞争性土地租赁地租(Competitive leasehold rents)^⑤。地租主要是实物(谷物),因为这时谷价正不断上涨,地主收取实物在市场上高价出售显然有利。

农奴的义务劳役取消后,庄园内领主的自营地(demesne)则招募雇工耕种,产品全为领主所有。但领主感到把自营地出租同样有利,且免于自己费神劳力去经营。于是,有的地方,庄园自营地也部分或全部出租给农民,采取分益佃耕制(Share-Cropping)^⑥。按照这种制度,领主除土地外,还提供种子、农具及房屋(或建房材料),收获不论丰歉与佃农按约定比率(1/3—2/3)分成。领主对佃农的经营有监督权,期满后也可收回自营。这种制度早先在意大利和法国的部分地方采用,以后推行于欧洲其他地方。庄园土地全部出租,意味着农奴制基本瓦解。

14世纪以前,不少领主还是顽固坚持旧制度,新制度实行还不普遍,而且开始时间先后不一。意大利中部的卢卡(Lucca)地区始于11世纪后期,英国始于11世纪末,德国南部巴伐利亚(Bavaria)始于12世纪,佛兰德始于12世纪中叶。

14世纪大瘟疫的后果,严重地改变了对领主有利的形势。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严重缺乏。据西方学者估计,劳动力减少了25%^⑤。这时,劳动力问题取代了原土地问题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不再是争出高价来承租土地,而是摆出自己的条件来向领主要求减低地租和高额的劳动报酬^⑥。他们的要求遭到了反对,领主们企图回到义务劳动的农奴制,甚至用法规来控制劳动工资,结果是激起了农民强烈反抗。在西欧广泛开展了农民运动,英国1381年的泰勒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起义还因政府苛征)^⑦。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庄园领主却不得不向农民让步,降低田租和承佃金,废除继佃金,因为这样总比让土地荒芜一无所得要好得多。威廉·艾贝尔列举了15世纪一些地区地租下降的情况:低地国地区安特卫普附近堤围泽地,每英亩地租在1379—1385年间降低了2%;1468—1476年比1465年又少1%。英国诺福克郡之福恩西特(Fornsett)庄园,每英亩地租从1376—1378年的11便士,在15世纪头10年降到9便士,1450—1460年再降到6便士。法国圣格尔曼(St. Germain des pres)寺院的地租,1360—1400年每阿邦为84第纳里(denari,即英便士),1422—1461年降为56第纳里,1461—1483年再降为31第纳里。德国巴伐利亚某寺院庄园地租总价值,1356年降到1350年的半数以下,1385年降到最低点。北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地区某大教堂,1352年地租总收入小麦7600吨,1437年降为2400吨,减少了2/3^⑧。《欧洲经济史——中古篇》记载说:“1430—1456年间,日耳曼武士柯布连(Coblenz)庄园收入减低40%之多;1397年法国诺曼底一个庄园的佃户共付地租152磅,1428年共交112磅,1437年交52磅,而1444年只交付10磅之数。”^⑨

佃农反领主斗争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农奴制的解体,凡仍然实行义务劳役制和雇工耕种领主自营地的封建庄园,都相继改为租佃制和分益佃耕制。西方学者们指出,农奴制的解体,“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由于劳动的缺乏而加剧”^⑩。只有在一些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的地区,以及人口稀少,或未受瘟疫袭击的东欧,农奴制依然如故。

在14世纪剧烈的变动中,不仅是地租收入大量减少,而且谷物价格大幅度下降。固然在瘟疫流行期间,土地无人耕种,粮食减产,谷价上涨得惊人,但这只是暂时现象。瘟疫过去之后,幸存的劳动人民,抛弃了边区产量不高的新垦地,集中到内地优质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提高单产;加上连续几年风调雨顺,农业获得丰收,特别是1375年,低地国家、德国中部与南部、法国东部以及英国,都取得大丰收。人口减少了,城乡对谷物的消费量也相应减少。凡此种原因,使得局部地区(不是全欧洲)的谷价长期下降。从个别地方看,下降幅度非常大。下奥地利的谷价在15世纪头几年,比14世纪下跌了3%左右^⑪。德国南部纽伦堡(Nürnberg)的黑麦,1375年每100公斤值74克银,1376年降为33克银^⑫。英国谷价在1377年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谷价下跌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下半叶,法国斯特拉斯堡黑麦价格,1484—1485年比1481年低75%^⑬。

在这样的形势下,领主们不得不放弃实物地租,改收货币地租,而且用政府特许状来确定。农民交纳货币也便于从实物地租束缚中解脱出来,适应市场需求,自由种植经济作物,多饲养牲畜以生产羊毛和肉类,还可从事家庭手工业。货币地租的实现,表明欧洲历史由中世纪迈至近代社会的大门口。农奴制的瓦解成为定局。

五

14世纪大瘟疫之后,欧洲农业社会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农业结构的调整,谷物生产向多种经营倾斜,农业向畜牧业倾斜。这些变化只限于西欧、中欧、南欧与北欧。东欧则是农业的谷物生产与庄园农奴制加强。

大量人口减少,劳动力匮乏,工资高而粮价低(畜产品价格并未下降),农民只进行谷物生产,显然无利可图。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尤其是承租大量土地的富裕农民,在商业利润驱动下,相继改变原单一的农业结构,除谷物外还有多种经济作物,诸如亚麻、大麻、染料(菘蓝、茜草等)、茴香、啤酒花及酿造啤酒的蛇麻草、葡萄(酿酒原料)、水果和蔬菜。这些作物所需劳力和成本也许并不少于种植谷物,但可获得远远超过谷物的巨额利润。如1490年莱茵兰一位农民种植水果,一年收入30荷兰盾货币,可买7000公斤黑麦,可供35人一年口粮^⑭。15世纪后期,葡萄栽培大为增多,尤其是传统种植葡萄的地方,如法、德、意大利。德国的葡萄园从南部扩展到中

部、北部,向东越过奥得河,到达东普鲁士。“甚至看来不适宜种植葡萄的地方,也种植了葡萄”^⑧。渔业也在农村发展。德国巴伐利亚地区,许多农田改建为鱼塘,收入超过谷物若干倍。该地之安贝格(Amberg)1438年的赋税册显示,1磅鲤鱼价值12第纳里,而100磅黑麦价值不超过18.5第纳里^⑨。也就是说,1磅鲤鱼价值66磅黑麦;1磅青鱼也价值10磅黑麦。可见,渔业无疑是较为有利的行业。挪威北部有个叫佛兰德纳格(Frandelag)地区,据说是该国“最后的农业岛”,到15世纪,其农业比重减少,渔村增加了^⑩。

改变最普遍的是改农田为牧场和草场,大量饲养绵羊。欧洲人的衣料主要是毛织品,故自古就有养羊的习惯,可以说无处没有羊毛资源。但多是自给,规模很小。较大者14世纪以前多在山区,如伊比利亚、意大利、希腊和巴尔干等沿地中海北岸的几个山脉绵亘的半岛,都是最集中游牧的地区。14世纪以后,迫于劳动力不足且昂贵,种植谷物投入多而获利微,养羊所需人力少而获利厚。这时,毛纺织工业有所改进,能织出中档和低档呢布,价格廉而销路广,扩大了为高档呢绒所限制的市场。14-15世纪以后,呢绒制造业不断向乡间迁移。这些因素促使呢绒工业大为发展,从而促使养羊规模扩大,牧养从山区扩展到平原,从游牧进而在固定牧场饲养。不仅边缘新垦农田,就是内地的熟耕农田,都有相当部分转为放牧的牧场和种植饲料的草场。原盛产羊毛的西班牙和英国的养羊业更加兴旺,农田圈为牧场的现象到处可见。西班牙半岛北部卡斯提耳(Castile)王国在13世纪成立的牧人协会(driver's guild),其势力更加发展,垄断了卡斯提耳的乡村,“使农业自身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⑪。分散的村庄合并为大牧场(ranch),“便于饲养牲畜和牧放绵羊”。政府允许小麦输入,以减少农田,扩大牧场^⑫。1440年,由东部港口巴塞罗纳输入的粮食,平均每年要花费两三万英镑^⑬。英国将可耕地用作牧场饲养羊群是举世皆知的事,特别是英格兰中部与东部地区,那里的天时地利更适合畜牧业发展。领主们以极大的注意力来饲养羊群以生产羊毛。有的领主强占公有地或荒地,把这些土地出租给牧主。有的领主把他们所在村庄的土地全部化为牧场。这些行径引起社会的关注。莫尔爵士(Thomas More)在1516年写道:“羊在吃人。”^⑭德国的畜牧业也有巨大增长,许多村庄的记录表明,其许多农田用来放牧。据一些保留下来的资料,挪威之奥斯陆地区,14世纪上半叶尚有2/3的

耕地,到15世纪都变成了草场。养羊业与呢绒工业相辅相成,同步发展,成为欧洲从中世纪走入近代的开路先锋。

畜牧业中饲养食用牛的事(制造奶制品和提供牛肉),在北欧的挪威和南欧的意大利得到发展。15世纪意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亚(Apulia)每年移动的牛群达到50余万头,农业被畜牧业挤到次要地位,田地亦被掠为牧场。北部的伦巴底(Lombardia)平原,15世纪草场大为发展,种植苜蓿、红豆草等饲料,一年收割6-8次。有人说:“意大利北部的畜牧业,是以减少谷物种植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⑮

欧洲中世纪农业生产水平本来很低,如今耕地面积又大大缩小,粮食不足可想而知。尽管畜牧业的发展能提供大量肉食品,但谷物毕竟是人们生活中的主食。西地中海北岸地区,尤其是城市,14世纪以前食粮就主要依赖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粮产区、西西里岛以及北非的供应。14世纪以后仍然如此。西欧、中欧和北欧,本地区农田缩小了,能提供的粮食非常有限,大部分依赖从波罗的海运来的东欧谷物。易北河以东广大地区,人少田多,受14世纪瘟疫的损害不大,农业一直在发展,能向西方提供足够的食粮。梅克伦堡(Mecklenburg)、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荷尔斯泰因、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立陶宛、俄罗斯,都是向西方供应粮食的基地。这些地方的粮食分别送到波罗的海南岸各港口,如但泽(Danzig今波兰之格但斯克)、斯德丁(Stettin今波兰之什切青)、卢卑克及汉堡,再由商人取道波罗的海,西运至挪威。低地国家、英国和法国,甚至远运到地中海西部海岸城市,“东德、波兰及波罗的海各国商业农业的发展,是15世纪的主要特征”^⑯。西欧、北欧及南欧为东欧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谷物市场。

东欧输往西方的不仅是谷物,还有食用菜牛。德国东北地区、波兰、匈牙利和俄国均畜养牛群,尤其是多瑙河与蒂萨河(Thiess R.)之间的大草原(匈牙利境内)饲养最多。匈牙利输出的牲畜占其向西方输出物品的55-66%^⑰。他们把牛赶到西北欧洲城市附近,养肥后投入市场宰杀。

东欧成为西方商业食物供应之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基地,但其庄园农奴制经济不仅未因此而瓦解,反而加强。封建领主为取得更多的粮食和畜产品,通过强制性的购买,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兼并,扩大其自营地,加重对农奴的义务劳役。已往,农奴对领主的义务劳役,一年不超过一天,15世纪增为一周一天,

16 17世纪更多。农民的自由移动受到严厉的限制,领主采取严密措施来阻止农奴逃往城市或邻国,强迫君主明确宣布他们对农民的奴役得到王国的认可,强迫城市放弃自古以来就有的庇护农民的权利,东欧此时农奴制的加强,与过去显著不同,庄园生产的目的不仅是自给自足,更主要的是为出售,是商品生产。丹尼斯·海说:“如果谷物输出没有取得大规模的农业利益,东欧庄园农奴制经济将是困难的”^⑩。这话完全正确,但不全面,应补充一句:如果没有东欧庄园农奴制的商品粮生产,西方社会迈入近代也是困难的。

注 释:

①⑤ ⑪⑬⑲⑳㉑㉒㉓㉔㉕ 庞兹:《中世纪欧洲经济史》(N. J. G. Pound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纽约 1974年版,第 150 441 203 166 214 165 147 219 442 443 217页。
 ② 皮埃尔·查纳:《中世纪后期欧洲的扩张》(Pierre Chaunu, *European Expans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纽约 1979年版,第 61页。
 ③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 1964年版,第 251页。
 ④⑥⑧⑨ ⑭⑯ ㉖契波拉:《欧洲经济史——中古篇》,台北 1984年版,第 133 161 163 160 161 33- 34 163 164 176- 177页。
 ⑦ ⑱ C. 迪兹:《英国经济史》(C. Dietz, *An Economic His-*

tory of England),纽约 1942年版,第 51 48页。
 ⑩⑫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威廉·艾贝尔:《13至 20 世纪欧洲农业的波动》(Wilhelm Abel,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伦敦 1980年版,第 40 30 75 18 39 38 139 39 38 39 39 30 31 63- 67 74 78 51 49 67 71 71 90 73 70页。
 ⑮⑰⑱⑳㉑ C. T. 史密斯:《1800年以前的西欧历史地理》(Clifford Thorpe Smith,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伦敦 1978年校订本,第 163- 164 169 250 480 366页。
 ⑳ G. R. 波特:《新编剑桥世纪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35 39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丹尼斯·海:《14 15世纪的欧洲》(Denys Hay, *Europ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伦敦 1966年版,第 32 34 38 373 39 40页。
 ㉑㉒ B. W. 塔奇曼:《遥远的借鉴》(Barbare W. Tuchman, *A Distant Mirror*),纽约 1978年版,第 94 10页。
 ㉑ M. M. 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4 卷 (M. M. Post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 I*),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62页。
 ㉑ 希尔加思:《西班牙王国, 1250- 1516》(Hilgarth, *The Spanish Kingdom 1250_ 1516*),牛津 1976年版,第 7 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

Europe Around Black Death

Xue Guoz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uthor Xue Guozhong (1929-),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15- 16th century world history.

Abstract Before "Black Death", European agriculture had long been back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rming techniques lagged behind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was to clear new land from forests and wastelands, but worsen environment, and finally caused "Black Death". The plague greatly reduced population, and caused a new problem: the shortage of laborers. Peasants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control of landlords, which moved the serfdom of Western Europe to its end and forced landlords in Western Europe to shift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from agriculture farming to livestock farming. Europe gradually moved to a new period of commercial economy.

Keywords black death; overpopulation; entry fine; share-cropping